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郭晓蓉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wwbkaogu@163.com
2024年10月11日

# 中外交流考古研究的楷模

王巍

王仲殊先生于1925年10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教师家庭。于2015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王仲殊文集》。文集全书共4册，收录了王仲殊的70余篇学术论文以及他主持的几项重要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是他60多年考古生涯成果的集大成。

王仲殊的学术专长为汉代考古学和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这一方向是1950年夏鼐先生为他制定的。1950年7月，王仲殊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8月初，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成为该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个从大学毕业分配入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入所一个月后，刚刚受聘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成为王仲殊的导师。夏鼐先生根据王仲殊在历史文献方面具有的良好基础，大学期间又学习了日语和日本文史的特长，为他确定了以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作为主攻方向，兼攻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数十年来，王仲殊一直坚持夏鼐先生为他制定的这一学术方向，矢志不渝，刻苦努力。

王仲殊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是从1950年10月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辉县琉璃阁汉墓的发掘开始的。这次发掘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学上的技术基础。此后，他先后参加、主持了长沙汉墓、汉长安城遗址、满城汉墓、敦化渤海墓、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1956年至1962年，他担任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首任队长，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所获成果为此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的发掘，为研究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书由王仲殊先生任主编，内容充实，叙述清楚，以坚实的研究揭示了渤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接受唐王朝的统辖，成为唐王朝在东北地区重要地方政权的历史，出版后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王仲殊先生研究成果卓著。除了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外，还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以及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专著，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说杯盘舞及其时代》《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中国古代墓葬概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等论文数十篇。

王仲殊还注重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钻研，做出了很大成绩。有独著的《从中国看古代日本》和《三角缘神兽镜》以及共著的《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奈良·平安之都与长安》《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古代日本的国际化》《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等多部著作，独著的各种论文则多达数十篇。他的研究主要有对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和对常出土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

王仲殊先生从事日本古代史和考古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勇于挑战日本学术界权威提出、被日本学术界所“公认”的观点。他在《考古》1983年第4期所载《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一文就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对日本的影响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明确主张7世纪末至8世纪的日本都城藤原京和平城京在形制、布局上仿效7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而不是日本权威学者岸俊男提出的仿效5世纪末至6世纪前期的北魏王朝的都城洛阳。这一观点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为日本学术界所接受。

到2004年为止，王仲殊共完成《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等8篇论文，充分体现了他对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所作比较研究的全面、系统和深度。

王仲殊先生对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也是用力最多的，先后发表了20篇论文，并结集形成以《三角缘神兽镜》为题的专著，于1992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98年再版。

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古坟时代（公元三到七世纪）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主要随葬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魏朝皇帝于景初三年（239）、正始元年（240）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卑弥呼女王又将一部分铜镜赏赐给各地的豪族，作为女王控制各地的手段。该理论为日本学术界所普遍信奉。

随着日本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快速进展，各地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数量大大超越了《三国志·魏书》所记载的魏王赏赐给倭女王的“铜镜百枚”之数。而这样的铜镜在中国却不见一枚。对此，日本学者的解释是，此类铜镜是中国皇帝专门为赏赐倭王而特铸的，即“特铸说”。

对此，王仲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类铜镜中有“陈氏作竟（镜）”“本是京师，绝地亡出”“用青铜至海东”等铭文，可证这类铜镜是中国的镜师亡命日本，在日本制作的。这种三角缘神兽镜的外区形制、纹饰与中国画像镜相似，内区的图像则与中国神兽镜类同，而画像镜、神兽镜均盛行在中国江南的吴地，故应为流亡日本的吴地工匠在日本制作的。王仲殊先生的论证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这一观点彻底动摇了三角缘神兽镜是魏的皇帝赏赐给倭国女王，又由女王赏赐给各地豪族的“三角缘神兽镜理论”。

众所周知，日本古代史和考古学的学者素以搜集资料齐全，研究逻辑缜密，观点理论扎实著称。能够对日本学术界泰斗级人物提出，并业已形成定论和体系的观点提出挑战，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更需要广博的中日古代史和文献学基础，还需要对中日两国相关考古资料的充分掌握，上述几个环节缺一不可。正因如此，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是十分困难的，也因如此，我国学术界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少之又少。

王仲殊先生在《王仲殊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指出，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考古学的同时，也应适当地研究外国考古学包括中外交流的考古学。中外交流考古学不应限于中国境内发现的遗迹、遗物，也要以国外发现的遗迹、遗物为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皆须参证中国和外国的文献记载。中国学者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其优势在于通晓中国考古学，但也须熟知相关的外国考古学和历史文化。他自己就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正因为具备上述意识，加上自己多年的刻苦钻研，勇于追求真理，才获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为中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做出了表率。

王仲殊先生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编撰工作中。他曾任该书编委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分卷主编，协助主任夏鼐先生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还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卷卷首的《考古学》序目是他与夏鼐先生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简明扼要地阐述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史。行文流畅，内容翔实，论据可靠，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文章。他还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大辞海》考古学分科主编。

王仲殊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他先后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他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在我们努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大力开展中外文明交流史研究的今天，王仲殊这位中国考古学界的学术大家在汉唐时代考古学和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研究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高校田野考古学课程模式的新探索

吴照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考古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作为教育部备案的一所全日制民办本科高等学校，河北东方学院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田野考古学教学的新模式，把课堂搬到校内外、实验室，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感和参与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加强硬件建设，构建实验室教学框架。腾出1000平方米空间作为田野考古实验室，打造出一个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室内模拟考古训练基地。在这里《田野考古学》的主要章节以展板的形式被展示出来，同时配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场景模型和图文介绍。学生们可以在田野考古模拟训练设备上，反复操练考古发掘基本技术。在6个5×5m的模拟考古探方中，复制了有代表性的房基、墓葬、灰坑、水井、城墙、陶窑、车马坑等遗迹，还有大型文化层形成过程仿真墙。探铲、无人机、RTK、全站仪、金属探测仪、探地雷达及多种考古装备，为实验室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深挖周边资源，开辟教学新天地。河北东方学院占地2100多亩，基本建设过程中曾发现6座汉至宋代墓葬并得到科学发掘；校区还有廊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郑忠墓，碑文记载了隋末农民起义和唐安史之乱的相关情况；在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还发现了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67）的乾隆行宫遗址和京杭大运河支流——风河故道。学校利用这些身边的文物资源开设露天课堂，带领学生进行实地文物调查、考古勘探，并进行文物影响评估、文物保护方案制定的实战化训练，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多方合作，提升学生综合能力。聘请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国内著名考古专家长期驻校，讲授田野考古学、考古探掘技术、考古绘图、考古学通论等课程，为学生带来考古一线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邀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发掘领队和全国文物行业技能大赛考古探掘工的获奖人员定期到校进行专题授课，将考古探掘技术“简单”化、实用化、程序化；组织专人编写《考古勘探技术与应用》教材，拓展应用型考古人才的培养渠道；增加科技考古与检测在田野考古教学中的课时，实现考古教学由单一注重探掘技术的培养向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变，促进多技术、多学科的协同发展；注重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按照“热爱、实用、多才”的原则，培养他们急需的人才；开展优秀毕业生定期返校活动，分享他们参加田野考古探掘工作的体会、经验和不足；推广“翻转课堂”“辩论课堂”“讨论课堂”“提问课堂”“操作课堂”“研究课堂”“启发课堂”教学模式，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建立把关机制，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规定在模拟实习前，必须通过田野考古虚拟仿真训练系统中的各项考核，彻底弄清各类遗迹现象的探掘程序，准确判定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和时代顺序。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参加校内田野考古实验场的探方发掘并按照程序完成各种遗迹现象的合规发掘，包括填写发掘记录表、绘制平剖面图、照相、修复出土文物等环节。通过以上两项学习考核的学生，才能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廊坊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校外实训基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实训环节的操作。通过多层次的考核和训练，最大限度避免不合规的作业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可能对文物造成的损害。

通过上述努力，河北东方学院田野考古学的教学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目前已有超过6000名学生接受了考古探掘技术的培训。文物与博物馆学教学团队被河北省教育厅认定为一流教学团队；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与修复等专业成为河北省高校一流专业建设点，并在全国应用型高校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田野考古学课程顺利通过河北省教育厅一流课程的验收，学院已成为教育部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工程基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实践基地。

（作者单位：河北东方学院文物艺术学院）

# 新时代田野考古档案管理的实践探索与反思

## ——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档案室建设为例

刘晨

田野考古档案作为记录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是田野考古发展历史的实物记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考古报告及各类科研成果，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可靠依据，具有重要的保存和利用价值。而考古档案的管理也是田野考古研究工作的重要保障，科学的考古档案管理工作是保护考古资料安全与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

随着各地考古工作蓬勃展开，各类考古勘探、发掘项目数量倍增，产生的田野考古记录资料更呈几何量级增长，这促使考古档案的规范化管理亟需提上日程。但是长期以来因考古档案管理工作不科学，引发了一系列常见的问题，如：原始档案收集不完整、档案资料分类不明确、档案存储条件不佳、档案数字化水平低、档案利用效率低等。

针对以上问题，202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新形势下田野考古资料管理的新要求，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2010）》，结合实际条件，设计建造了相对符合标准的档案室。新档案室的建设旨在加强考古档案的收集工作，确保考古资料的完整性；建立科学的考古档案分类体系；改善考古档案保管条件，确保档案的长期保存；提高档案数字化水平，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优化档案利用流程，提高档案利用效率，更高效地为山东考古事业的发展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机构从事科学、文化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应当归入档案。田野考古档案是指田野考古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文字、图纸、表格（登记表、统计表等）、照片、拓片及各类电子数据、视频等原始记录，是田野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基础信息，具有珍贵的保存和使用价值。

田野考古档案是记录田野发掘工作中的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长期从事田野考古档案的管理工作，发现管理工作中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因客观原因造成的档案损毁问题。以下笔者将近一年来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事的考古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介绍和总结，希望能为同仁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

### 考古档案管理内容

田野考古档案管理是考古研究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它涉及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方面内容。

**档案的收集与整理**

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资料，这些资料需要考古发掘者先进行系统的整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试行的《田野考古归档实施细则》要求对各类资料进行统一的登记、编目等初步整理，经档案室工作人员审查后方可进行考古资料的移交工作。移交过程中要确保资料目录的详尽，以及考古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档案室在接收到移交的考古资料后，需按照归档标准进行整理，包括对考古资料进行分类、编号、记录等，以便于后续的保管和利用。

**档案的保管**

田野考古档案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因此保管工作至关重要。档案应该存放在安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受潮、霉变、虫蛀等损害。同时，还要定期进行档案的清理、修复和保养工作，确保档案的完好保存。

**档案的利用**

田野考古档案的利用是档案管理的最终目的。首先，保存完善的考古资料为考古报告的整理和撰写提供可能，是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保障。其次，通过对档案的查阅、分析和研究，可以了解古代文化、历史和社会变迁等信息，为考古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档案也可以为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等提供重要的支撑。

**档案的数字化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田野考古档案的数字化管理已成为趋势。通过档案数字化处理，可以方便地进行存储、传输和检索，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同时，数字化管理还可以有效防止档案的损坏和丢失，保障档案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利用。

总之，田野考古档案管理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支撑。通过科学、规范的档案管理，可以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为考古学研究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档案室现有柜架类别包括普通密集柜架、临时周转柜架、图纸柜架、防磁柜、恒温恒湿柜、珍贵资料储藏柜等。

档案室内工作区包括临时周转区、资料整理区、资料储存区等。

档案室职责是负责单位考古资料档案的整理、上架、借阅、保管等工作。

现存档案有山东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材料、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材料、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保单位“四有”材料，历年上交的考古遗址调查、勘探、发掘的原始文字资料、图纸、照片、拓片、各类电子档案及已出版考古报告的文稿、图稿等各类考古资料。

其中考古发掘档案占绝大多数，初步统计涉及遗址300余处（包括国保、省保遗址210余处；调查、发掘遗址170余处）。此外，还有大量的田野考古资料在逐步上交。

### 考古档案的初步整理

在实际工作中，档案的初步整理工作包括除尘、分类、登记、装盒、上架。

一些老旧档案因常年放置存在大量积尘，工作人员在保证资料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吸尘器人工擦拭除尘后进行分类归档，先对所有项目按照工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序，再按顺序逐个对单一项目的档案进行整理。将单一考古项目的所有资料按照发掘总记录、探方发掘记录、各类遗迹发掘记录、出土文物登记表、照相登记表、各类采样表、各类文件、总平面图等进行分类，再检查探方和遗迹资料袋内的档案如发掘记录、图纸等相关文件是否齐全。检查完毕后按照探方及遗迹顺序号排序、归档、填写《考古资料明细登记表》，并依次装入档案盒，盒外标注遗址工作年代、遗址名称、内容、盒号。遗址总图一般情况下体量较大，登记后单独存放于图纸柜中。图纸柜主要存放各类地图、各地遗迹分布图、各遗址体量大的图纸，以及各类拓片等。

### 总结与思考

通过半年时间，院藏老旧档案（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考古档案）完成基本信息的初步整理，现将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总结如下。

田野发掘记录中有些遗址的名称所有档案中只有拼音缩写，汉字名称从未出现，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调查或试掘的遗址，这些档案年代久远，有的未经整理发表，参加当年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多已离世。因此，遗址地点、名称无法确定，给基础资料管理及整理发表等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此基础之上的科研工作更是无法展开。整理过程中发现近年来的一些考古项目也存在只写拼音缩写的现象。

一些早年拍摄的照片存在记录信息不全的情况，如未标记遗址名称和拍摄日期，或只标记遗址名称未标记拍摄日期。几十年来遗址附近地貌改变，一些遗存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无任何标注的遗址、遗物照片大多难以辨认，这也给资料整理、文物保护等工作造成了巨大阻碍。此外，在照片保存方面，年代比较早的照片在保存环境比较潮湿的地方会被霉菌、虫蛀等破坏，如果照片存放在塑料膜覆盖的相册里也会出现粘连的现象等。这些都给照片的保存和管理带来困扰。

在对拓片的整理中发现，不同于各类图纸上一般都有遗址名称、绘图者、图纸名称、比例、绘图日期等详细记录，即使脱离原始档案袋也不会被混淆，拓片资料上大多缺乏具体记录，如一些大型汉画像石墓拓片仅标记了所在墓室的位置，缺乏其他有效信息，特别是一些未发表的拓片资料，更难确定其所属遗址，这也给整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遗址记录本浪费问题。以往考古工地的发掘记录和日记等多为装订好的成册的记录本，适合一些发掘内容丰富和工期较长的大型遗址。但是对于大部分调查、试掘的小型遗址来说，使用这类记录本就存在很大的浪费，相当一部分遗址发掘内容仅记录数页或十数页，后面的空白页无法继续使用。

纸质档案的保护工作也面临较大压力。由于历史原因，早年收藏的一批珍贵的老照片、拓片保存现状不好，存在发霉、虫蛀、酸化等情况，给资料整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现阶段已启动了部分纸质文物的修复工作，部分纸质档案的整理还需修复完成之后再进行。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采取了以下几个应对措施，希望能够为考古档案的管理提供借鉴。重要的遗址各类记录均需写明遗址的汉字全称，一般遗址可在部分具体记录上以名称首字母或汉字简称等标记，但档案袋外部等需写明汉字全称。拓片的记录可以参考图纸记录，详细地登记图号。提前设计方便装订的活页发掘记录表，无论是大型遗址还是小型遗址都可以各取所需，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时，档案管理部门还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田野考古档案事业的发展。例如，与田野一线工作业务人员加强联系，确保考古资料的及时收集与整理；与档案管理部门加强沟通与交流，借鉴先进的档案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与纸质文物保护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开展纸质档案保护的研究与利用等工作，推动田野考古档案管理与保护的发展与创新。

此外，纸质档案的数字化管理也是大势所趋，一般采用平面二维扫描的方法进行。纸质档案易损毁，田野考古档案又具有唯一性，从长远来看，纸质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是必要的。通过扫描，将勘探发掘记录、遗迹遗物照片、拓片图纸等数据采集并备份保存，一方面方便查阅，另一方面也可将纸质档案因意外损毁或丢失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关于备份的存储问题，目前基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将数据通过服务器上传到云端，一种是存放在固定服务器的硬盘或移动硬盘里。数据保存在云端能够很好地解决硬盘容量不足的问题，但是云端的一个缺点是可能会造成数据的泄露，安全性相对较低。使用服务器硬盘存储资料能够很好地解决数据的安全问题，同时对网络没有要求，但对于远距离的使用方便性略低。两种电子信息存储方式各有利弊，无论如何选择都要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目前，纸质档案的数字化整理已被提上议程，前期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相信今后的考古档案管理工作在更加规范的制度保障下、在各级领导的日益重视下将更加合理规范，并在考古研究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Ltd.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联系人：张总 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